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se
Since 1949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一卷

The First
Volume

主
编
王
景
科



山东
友谊
出版
社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一卷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散文典藏. 第1卷 / 王景科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80737-862-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7483 号

封面图: 田忠泉

责任编辑: 张亚欣

艺术设计: 姜海涛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 话: 出版管理部 (0531) 82098756

市场营销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40mm × 960mm 1/16

插 页: 6

印 张: 28.7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策 划：丁建元

主 编：王景科

编委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

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

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

序言

历史的足迹与心灵的影像

王兆胜

在众多文学体裁中，散文有其独特优势及魅力。这主要表现在：一、它更为真实、质朴和内在反映民族国家与人民生活的变迁，是一本不可代替的日志和备忘录。二、它是作家与读者的投影，因为散文往往最好地反映了作家“这个人”，也是与喜爱它的读者进行促膝谈心、心灵对话的最佳方式。三、它更多、更直接、更好地承载了人生的智慧，令读者从中受益匪浅。四、它丰富多彩、自由潇洒、平淡高远的格调令人爱不释手，读者可随意选取、尽情而读、败兴而弃，完全不受时间、地点、场合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下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逐渐失去读者的情况下，散文却能青春永驻、经久不衰。

与此相关的是，多年来，散文选本层出不穷，且颇受社会和读者喜爱。如每年的散文年选都有近十个版本，且多年来持续不断；又如散文选刊、各类的散文选本、关于散文作家的个人精选本更是花样翻新。这些选本像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令人百看不厌。如今，由丁建元策划、

王景科教授主编的十二卷本《新中国散文典藏》出版，这是散文界与中国学界的一件大事，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界碑和标志。

《新中国散文典藏》主要选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新世纪2013年之间的散文，六十多年的历史跨度本身就是一次飞渡，更何况其中又经过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这样的巨变。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促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新变局，这无疑会成为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崛起及其在中外文坛形成散文旋风的时代背景。可以说，以散文的形式对六十多年的“新中国”进行“典藏”，其历史功绩一定是超过预期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一、文化基因与密码珍藏

如果谈论“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及其文学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人们会异口同声说：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下，中国现代性的建立。也是在此意义上，进化论、创新、向西方学习等成为我们的关键词。关于这一点，作家和学者走的基本是这一路径：符合西方标准、向西方学习，就是创新；而有了创新，就是好，就给予充分肯定。

也许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上可作如是说，因为西方在这些方面有不少优势。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就此绝对地说，《红楼梦》不如西方小说，《牡丹亭》不如西方戏剧，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的诗不如西方，那恐怕也难以令人认同。最关键的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到底学的是什么，能不能学到其精华，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再造和创新，这恐怕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向西方学的只是皮毛，

而作家和学者即将之视为创新，那就大错特错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其实，不少所谓的当代新潮小说创作及其研究就建立于这样的理念与基点上。如果以这样的认识来简单要求中国散文，那将更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这就容易导致对于中国散文理解的偏向和错误。

第一，在中国古代，散文不叫“散文”，而是泛指“文章”，它是一个更大、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到了近现代，“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形式才得以确立，中国传统的“文章”才变成我们通常所说的“散文”。而自周作人提出“美文”后，散文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缩小和纯化，于是散文变成一个更为纯粹的“洁本”。很显然，在西方散文概念与中国文章内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偏角，如果不顾及中国传统的特性，就会出现断裂与矛盾。

第二，无论怎么说，向西方看齐，以西方标准来衡定中国传统散文，并建构具有现代性的近现代中国散文，这是新文学以来比较一致的倾向。五四时期的周作人、郁达夫讲究散文的“个性”，20世纪60年代的杨朔注重“将散文当诗来写”¹，新时期的余秋雨散文则注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都是如此。这一面带来了近现代散文的突围与发展，但也使其离中国传统越来越远，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余秋雨的《笔墨祭》用西方的现代性来阐释中国的毛笔文化，其中的文化断裂非常突出。

第三，20世纪80年代曾兴起这样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即全面、急迫而又不加选择地引进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于是，一场“方法论革命”席卷中国。有趣的是，在小说、诗歌等文体“日新、日日新”的时候，散文界也出现极为强烈的求变呼声，因为散文仿佛是一只巨大的破船，

它不仅没有新变，而且仿佛是心安理得地在拖其他文体的后腿，并影响了新时期初期的整体文学格局。那时，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² 仿佛散文一夜间成为一个深陷泥淖的落伍者，再不奋力拔起，就会转瞬即逝，走向终结。这恐怕是有史以来关于中国散文最为悲观的“毁灭论”。而与之相映照的是，新时期以来散文创新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它甚至成为一些先锋追求的目标和反传统的快刀与利箭，这也是所谓“新散文”不断受人追捧和发出绝叫的理论前提。

但无论如何，自从中国古代文章被西方现代散文分割之后，它就被捆在西方现代性的马车上，并以加速度向前奔跑，从而形成了其悲剧性质。一方面，创新的引诱使现代散文离传统越来越远，其异化随处可见；另一方面，被现代性和创新意识甩下的散文，几乎成为保守、落后、无用的代名词，它也被先锋派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弃如敝屣。可以说，只用西方现代性尤其是创新理论看待中国散文，必然导致其悲剧性的命运。

应该说，从西方现代性包括创新性角度，来建构和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并没有错，这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重要方法，也是从世界文化大局着眼所做出的有价值的努力和探索。不过，如果将此视为唯一甚至绝对的标准，那就不可取了。如果将西方的糟粕当成精华来吸取，尤其是不能站在人类命运和发展的高度，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甚至不顾各种文学体裁的特性，简单地进行搬用和类比，那就值得注意和研讨了。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有不少人没有跳出这样的樊篱。

近现代中国散文的价值当然可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以获得其现代性意义。如研究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更多的人往往站在现代性角度看到其反封建意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但却看不到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韵味，更看不到现代与传统的交战与搏斗。因此就无法理解，《野草》中竟有《雪》《好的故事》《腊叶》这样优雅的作品，也难以理解在《朝花夕拾》中也还有《二十四孝图》和《五猖会》这样尖锐作品的穿插。因此，我认为，除了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看鲁迅的这两部散文集外，还要从传统与现代的交集与变奏角度给予解释，尤其不能忽略从传统文化角度的流风遗韵来进行审视。而最后一点，往往在那些所谓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与诗歌中不易看到。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近现代和当代新潮小说的创作与研究需要重新评价。这是因为，它们所受的西方影响多是一种因袭甚至模仿，还不能算是创新之举，如果从中抽掉所受的西方影响，它们恐怕所剩无几，至少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更不要说基因和密码了。因此，一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将来恐怕要重写，其结论是：以往被认为有现代性的文本，价值会大打折扣；而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愚昧的传统文化因素，如今则会获得新的价值认定。因此，一直不为人重的散文文体将会获得新的价值增值，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传统文化因素的保留，以及它与现代文化的张力关系。

朱自清的《背影》可谓中国现代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但我认为，其最大价值恐怕不是如鲁迅《野草》所表达的现代性诉求（尽管其中也有人生的苍凉意味），而是流动于中国人血脉中的父子情深，尤其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母题，及其表达方式的平淡、自然和细腻。在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虽然充满着现代人的悲剧的意味，但它们最有魅力的地方恐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知音之感！据说，1959年，俞平伯一行人前往江苏视察，到达朱自清的故乡扬州时，他心事沉重。后来，俞平伯离开大家，一人去南京。对此，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看到俞平伯的《重游鸡鸣寺感旧赋》，方知道他是想起了好友朱自清，做了故地重游的。³这是中国传统士子的知音之感和高古妙音。如用西方现代性和创新性解读这两个作品，就会进入误读时空，因为二者在主题、审美趣味甚至是题目上都难以区分，没有所谓的创新。因此，不能用现代性和创新性去简单解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散文。

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流失与保存的交织的眼光，通过“朝花夕拾”忆旧的方式，我们就会看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散文有着独特的价值。因为在义无反顾的反传统文学体裁中，我们已难看到传统文化的面影，甚至也看不到传统与现代转换的迟疑与停留，而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和崇尚之情，这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尤其是要突破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进入现代民主制度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所谓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现代性，而是人类理想的现代性，因此，我们要承认，“现代性”不是西方的专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现代性，至少有现代性的因子。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成分，尤其是其中有五千年的文明基因与密码，我们不能毫不顾惜地将之随意丢掉。第三，文化与文学除了创新，更需要继承，因为继承

既是创新的基础、动力和源泉，又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常态”。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就包含了这层意思。第四，向西方学习固然重要和必要，但不能离开中国本土，因为西方再好的东西到了中国，都需要接受新的检验，也需要以中国作为轴心进行转换。这正所谓“变是为了开新”，而“不变则是为了通久”。因此，在探讨散文中“变”的因素时，不能忽略其“不变”的方面，尤其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的内容。这是只从散文的现代性和创新性上难以看到的重要方面。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散文，包括秦牧、刘白羽、杨朔三大家的散文，往往被不少研究者视为跟不上时代步伐、缺少创新性的“散文文体”。然而，如从另一层面看，它们正显示出其承载中华民族基因和密码的巨大功能，也包括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得以承继和绵延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要从观念上克服偏激和狭隘的理论，尤其是不能受制于西方的逻辑误区，站在中国立场、中国文化价值优势以及创新的角度，来重新梳理和看待新中国异常丰富复杂的散文脉动。《新中国散文典藏》就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裁剪，而有了更大的胸襟与包容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中表现最为突出。

二、时代感召与现代忧思

新中国散文的另一重要向度是关注现实，在与时代和社会共进的情势下，做出自己的理性思考。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散文基本见证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和世界潮流的流向。这里，既有顺

向的歌咏，又有逆向的批评，还有超越性意向的反思，其立足点在“现实”，其价值理念是现代意识，其方向则着眼于未来。这在“十七年散文”中有所反映，在新时期散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诸如知识分子、环保、生与死、贫与富、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艺术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人生、人性、思想、文化和文明的健康与发展，也是作家社会良知与担当意识的充分体现。

首先，在新时期最早引起散文家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贬值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开放、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变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的特点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知识的贬值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必然引起一些有良知的作家的注意和思考。冰心可能是最早呼吁国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家，她于1987年双十节的“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于是《我请求》这篇散文得以诞生！作者针对当时中小学教师待遇低和教育危机的问题，发出急切而深情的呐喊。第二年的11月，冰心又写了《无士则如何》，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除了农、工、商、兵外，绝不能无“士”！她这样界定说：“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文章结尾，冰心老人这样说：“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⁴几乎与此同时，臧克家写了《博士之家》一文，这是针对居住在北京赵堂子胡同14号几位博士的艰辛生活状况，所发出的痛心疾首的悲鸣！这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快人快语，对社会的不公、腐败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溢于言表。

林非也一直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文化的贬值问题。在《招考博士生小记》中，林非一面怀着求知的理想，一面又含了莫名的忧虑。这是因为，对于求知来说，让青年人读书上进功莫大矣！但想到一贫如洗的青年学子，背负着父母的债务，过着异常清贫的求学生涯，在没有美好前途预期的期待中，林非不得不陷入深思和自责中。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林非对社会不公尤其是知识分子命运的苦苦思索，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具有代表性。后来，张承志和张炜等人开始思考“人文精神”问题，像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虽然是历史题材，主要是写中国古代尤其是荆轲之“洁”的精神的，但显然主要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知识分子；张炜在《悲观与喜庆之间》等散文中着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应有怎样的思考与实践？在看似喜庆的节日般气氛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伦理、人性、价值等问题。韩小蕙也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她在不少散文中都强调理想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道义，并将之作为一种范型进行高歌与赞美，像《季羨林：大儒无声》《追念布衣学者张中行》都是如此。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与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也是面对知识分子的：前者重视“破”，即对在中国流行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虚妄进行批驳，强调建立健康自然的文化价值理想；后者重视“立”，坚信“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与人类之重要意义，它是自由与快乐的源泉。基于此，张炜、张承志、韩少功等人选择了与“都市生活”不同的“跋涉在莽野”式的生活，从而实践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南帆写过《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及其生活场域的理解与张炜等人有些不同，

而是充满某些复杂性和困惑；但对学院式知识分子的大胆的批判甚至嘲弄却是一致的，即在现代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以独立的思考、伟岸的人格、饱满的精神和形而上的信念见长，而只是平庸、萎缩、封闭、功利的“学院”书虫，那是既荒唐可笑又悲哀可叹的事情！应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国家的大脑和神经，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散文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然而，能够做到真正自觉、富有理性和深度思考的却不多见，偏于一隅者有之，过于传统者亦有之，跟随时代风潮与世俗图景者也有之。在中国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多联系的时代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自己的智慧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整个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独特的作用，我们的散文还缺乏更多更好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富于人文和学术增长点的话题。

其次，环保是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它既是世界的，更是中国的，因为发展与污染、破坏、和谐等必须放在一起考虑。作为社会敏感的神经，文学尤其是散文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反映。这既与旅游文学连在一起，又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相伴而生。李存葆在自然环保的书写上用力最多、最勤，自觉意识也最强。他的《鲸殇》《大河遗梦》等都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前者有感于人类对于鲸之疯狂捕杀，提出万物生命平等、和谐共处的问题；后者则对于黄河这条母亲河之悲剧命运忧心忡忡，于是发出了爱护和保护的呼吁。除此之外，还有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梅洁的《楼兰的忧郁》、迟子建的《祭奠鱼群》、刘长春的《鱼之忧乐》等，都是生态意识浓

郁的散文，从而使其作品境界高，有阳光般的温情，有博大的爱心。另一种环保意识表现在关于文化遗产的散文书写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冯骥才和祝勇。在《年文化》中，冯骥才着力提倡重视和保存“年文化”这一中国式的民俗文化，《抢救老街》则主要书写的是天津老街的重要性与历史文化价值。祝勇早在90年代初就写了《北京之死》一类文章，大力呼吁重视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后来写成的《木质的京都》中，作者通过日本对于京都的完好保存，更强烈地指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还有一种属于心灵环保散文的写作，也可以称之为绿色心灵写作，张炜、迟子建、王开岭、毕淑敏、楚楚、肖凤、梅洁、陈祖芬、赵丽宏、苇岸等人较有代表性。在他们笔下没有粗暴、快捷、焦虑，而多是一种细腻、缓慢、平淡、温柔，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心灵的力量和柔性的美学。如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毕淑敏的《造心》都是以“心灵”的纯洁美好为旨归，于是希望将大写的“人”提升到一个崇高美好的境界。这种精神明亮、心灵纯良的散文书写，是一种人心和人性层次的环保，它与前面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散文共构了新时期散文写作的一种模式。当然，如何摆脱公共话语、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书写中，这是环保绿色散文写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再次，“生”与“死”是文学创作永恒的母题，它当然也是新时期散文的重中之重。我国古代早在庄子和王羲之的散文中就有对于“生”和“死”的明智认识，如《兰亭集序》里有：“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

随后，李白、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等人也都有类似的生死观。这里，明智有之，但其不足是过于悲观和虚无了。后来的鲁迅和周作人也基本上是如此。新时期以来，探讨“生”与“死”的散文非常之多，且佳作迭出，深受读者喜爱，这是因为，“生”与“死”与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对人的触动也最为深刻，给人的震撼亦最为强烈，而对作家本人来说往往都是其“血泪之作”。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的经典之作，就在于它将“生”与“死”作为思考的中心和感情的出发点，并在悲观与虚无中有所超越。一个残疾少年坐在轮椅上，在孤寂的地坛里，伴着朝阳晚霞、春花秋月、秋风枯草，凝听生命的歌唱和悲吟，于是参悟生死之理。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悲观下去，而是说：“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⁵其实，史铁生的不少散文都是对于“生”与“死”的探问，一种在“悲剧”中体验甚至创造快乐、幸福和意义的努力。在这方面，周国平的散文就多了一些通透与明净，有一种思考生死而又能“跳出”生死的宁静之心。另一位学者散文家林非也有健康明朗和超然达观的“生死观”，他在《死亡的咏叹》和《再说死亡》中，将“生”与“死”同“是否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相提并论，从而显示了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意义，这更显示出一种高度和境界！就像钱穆所言：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关键看其是否有一种精神，是否能够在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发展中注入一束精神之光，所谓“永恒”与“腐朽”也只在此有了分界！他说：“孔子之生，老而死在鲁。但其魂气，则常周游，普及全中国。死而犹然。迄今两千五百年，可谓孔子魂气尚在。中国人心中尚有孔子其人，此

即孔子之魂气。亦可谓今日国人之心，亦能远扬两千五百年前，与孔子当时魂气相接。中国人又常言精魂神气，前人言魂气，后人言精神，此即一种精神人生，亦可谓乃人生之大生命。”^⑥显然，只有当个人的生命以“精神”的方式得以传承时，它才会更有意义。还有彭程的《快乐墓地》也是以从容达观的态度思考“死亡”，在许多人将坟墓看成恐惧甚至咒语时，彭程却对死亡和坟墓不再心怀恐惧，甚至能够从容快乐地面对，并有着一颗平淡之心，如此，一个人也就真正地超脱了，也会获得生命的本真感悟和大自由。在新时期散文中，表达“生”与“死”主题的佳作最多，而以书写亲情者最为突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孙犁的《亡人逸事》、秦牧的《梦里依稀慈母泪》、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宗璞的《哭小弟》、林非的《离别》、阎纲的《我吻女儿的前额》、潘旭澜的《小小的篝火》、王充闾的《碗花糕》、肖凤的《人间重晚晴》、尧山壁的《母亲的河》、陈忠实的《晶莹的泪滴》、梅洁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贾平凹的《祭父》、孙建平的《轮回》、素素的《父亲》、张炜的《人生麦茬地》、朱寿桐的《从俗如流》、李登建的《去看母亲》、熊育群的《生命打开的窗口》、王兆胜的《与姐姐永别》、迟子建的《悼三姨夫》、张国龙的《和父亲关于死亡的对话》、臧小平的《父爱如天》等。另外，写乡情、爱情、友情、师情等方面的散文在新时期也格外引人注目，如写爱情的有王充闾的《小妤》、蔡桂林的《爱情的守望》、胡发云的《想爱你到老》、梅洁的《不是遗言的遗言》、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臧小平的《初恋》等；又如写师情、友情的有从维熙的《凝视孙犁》、韩小蕙的《悠悠心会》等，都堪称至真至情的